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十九期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编者的话：一九三三年的《东方杂志》上，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发表了自己的“新年梦想”，章乃器先生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

为实现这个梦想，他们以电影等文艺形式为武器，通过“合法斗争”，配合“左倾的革命”，有效地打击了那个允许他们进行“合法斗争”的“非法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民营电影”略为打点，便大展宏图，资本家施展手段“调集头寸”；艺术家自由发挥想象力，大家如入无人之境，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传世之作由此诞生。

读老一辈电影人对那一时期的回忆，若不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还真差点儿忘了那是在笼罩着“白色恐怖”的“敌占区”。

不过，问题在于，“民营电影”真的是“民营”的吗？从一开始，它的观念、资本乃至人员构成，就有着政治党派的影子。因此，严格地讲，它是“遵命文学”。但它不知道的是，祸根已经种下，一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为它埋下了伏笔。

在大家发表“新年梦想”的十六年以后，梦想实现了，“反动统治”的丧钟敲响了。欢庆之余，却不知丧钟为谁而鸣。对《武训传》的棒喝分明昭示着“如今竟是谁人的天下”，“旧社会”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所谓“批判现实主义”不过是死路一条。事实证明，将自由的艺术改造为驯服的工具的过程足以使斯文扫地，不仅触及灵魂，而且触及肉体。

如果说“八千里路云和月”与“一江春水向东流”是“黑暗的旧世界”中的呐喊和叹息，那么，在这个“美好的新世界”里，连叹息都不能有了：普天同庆之日，什么人才会向隅而泣？

正如作者所说，这两部影片的名称暗合了中国“民营电影”的命运。前者引自抗金名将岳飞，堪称壮怀激烈；后者引自亡国之君李后主，却是无可奈何。

二十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章立凡

1979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陪女作家胡兰畦先生到协和医院去看望阳翰笙先生。

这两老是四川老乡，又都是父亲的故交，有我同去，话题自然会转到父亲身上。阳翰老说：“乃器先生同我是老熟人了，四十年代他投资拍进步电影，我还是牵线人咧！”

那次的交谈，触发了我对父亲与电影业历史渊源的关注。记得“文革”中有外调人员来调查父亲与电影界友人的关系，他坚持按历史事实写材料，并与来人发生了争执。

事情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谈起……

再造“联华”

三人投资两个外行

电影事业素有“梦工厂”之称，家父章乃器则是近代史上一位有名的“逐梦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愈之主持《东方杂志》时曾有一项壮举——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在该杂志1933年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父亲也是撰稿人之一，并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他的文化建设理念，在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

影音声光的特殊魅力和大众传媒效应，使电影艺术成为二十世纪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国民党政府竭力将电影事业垄断在自己手中，抗战胜利后又接管了敌伪电影产业。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酝酿筹组一个民营制片机构——联华影艺社。

成立制片机构的方案确定之后，原联华公司同人通过合法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发还了当作“敌伪财产”接收的徐家汇摄影场，联华影艺社成立后，取得该场部分摄影棚的租赁使用权。

联华影艺社于1946年6月成立，当时担任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的父亲被推为总召集人，议决分别由史东山、蔡楚生负责，准备拍摄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笔制作经费十万美元，由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三人分担。

父亲晚年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联华的三个投资人中间，任宗德和我算是同行，都是搞酒精的。夏云瑚是四川袍哥中辈分不低的人物，当过重庆国泰戏院的老板，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对电影制作发行也比较内行。我那时对电影制作是外行，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而投入，这里面水有多深是不清楚的……

一人退出

“联华”改组成立“昆仑”

战后的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两种恶劣倾向：一是官办的电影机构不惜投入重金，为国民党政权歌功颂德；二是民营电影公司为追求利润，低成本粗制滥造各种媚俗下流产品。联华影艺社以大资金投拍严肃题材的巨片，在当时的电影业中可谓独树一帜。

《八千里路云和月》取材于随军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时竟无处容身；而江的表兄周家荣战时大

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作品以生动的电影语言，描绘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

《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上海纱厂女工素芬与教师张忠良一家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沉浮，揭示了中国女性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对于张忠良在大后方纸醉金迷中的堕落，实施了灵魂的拷问。

父亲晚年曾谈到，当时制片耗资巨大，几乎吃光了他手头所有的流动资金，不得不四处调集头寸，以保障拍摄的正常进行。据说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之一，是找老朋友吴蕴初帮忙，这位“味精大王”照例会给他一张产品提货单，倒手就可变出现金来办事。

父亲虽号称“战时理财专家”，毕竟在电影投资上是新手；而导演为追求艺术效果造成的制作期延宕和成本加大，也不是事先可以预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公映后，理论上虽可回收部分投资，但在结算周期上却缓不济急。

任宗德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作为总召集人的章乃器先生日渐感到自己在创作、管理尤其是在经济上都作不了主，也不及时向他通报有关情况，愈来愈对联华影艺社的状况不满意。1947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映，《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拍摄了一半，但所投入的十万美元资金已全部用完，联华影艺社面临着拍摄经费的巨大缺口。此时，虽然《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炮打响，受到好评，但是章乃器先生还是坚决地表示了退出联华影艺社的态度。阳翰笙与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接受章先生退出的意见，并将联华影艺社改组为影业公司。”

对民营电影制片机构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蓝图，当时存在不同见解。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父亲显然不喜欢电影界“草台班”式的习气，希望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进行管理。他对中国战后电影业的发展颇具雄心，据说第一步计划筹集美金十二万元，完成一两部大制作后，再吸引外资扩大到六十万美金的股本，参照好莱坞的制作运营模式，组成一个民营影业托拉斯，与官办电影公司分庭抗礼，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为中国的民族电影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虽然他认同左翼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但这套发展蓝图，显然与中共的领导方针不大合拍，后者一向是以俄为师，更重视电影的政治宣传效应。194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就明确主张：“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1957年“反右”时，父亲的民营电影发展方案被翻出来批判，作为他“投靠美帝”的罪证。

由于在发展方向和人事上的分歧，父亲所代表的上川企业公司资金，没有转成昆仑影业公司的股本，仅作为对《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的投资。根据昆仑公司在1950年给父亲的信件，在分红比例上为两片三集发行收入的四分之一。

巨片公映

民族电影压倒西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于1947年9月完成，与原联华影艺社摄制的上集《八年离乱》以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道，统一由昆仑公司发行。《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昆仑推出的第一部影片，但它是以联华影艺社的名义

出品的。

《八千里路云和月》公映引起了轰动，被西方影评家称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半纪录片”。田汉曾评价该片说：“这戏据说以一万万八千万的预算而用到五万万，超过一般国片的成本，曾使某些短视的投资者摇头却步，但这钱证明没有浪费，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夏衍在致史东山等人的信中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联华再创之夕的誓词，现在第一战的战果发表，你们是光辉地全胜了。”

在票房价值上，《一江春水向东流》更胜一筹。该片于同年10月在上海首映，连映三个多月，场场爆满。据当时报刊统计，首轮观众人数为712874人，占全市500万人口的14%以上，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看过此片，创造了1949年以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票房超过好莱坞进口片。战后美国片商大量向中国倾销其战时制作的影片，排挤民族电影，上海的大光明、美琪等头轮影院，历来专映西片，此时撤下了美国影片上映《一江春水向东流》。

《一江春水向东流》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鸿篇巨制，是毫不夸张的。记得我幼年观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此片，上、下午各看一集，觉得时间甚长；上小学后再次观看，则是上下集连映，反而短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原片全长七个多小时，1956年方剪裁为三个多小时。

两大史诗巨片的诞生，使昆仑公司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主角白杨、陶金成为如日中天的“影后”和“影帝”，主要配角吴茵、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也拥有上好的口碑，吴还获得了“东方第一老太”的美誉。两片是中国影坛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扛鼎之作，也永远奠定了史东山、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

分道扬镳

三人行终成独角戏

联华影艺社于1947年5月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投资人为夏云瑚、任宗德和蔡叔厚。按股本比例计算，夏占六成，任占三成，蔡占一成。蔡叔厚这一成，实际上是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出资。夏云瑚任董事长，负责行政、发行；任宗德任厂长，管制片、生产；蔡叔厚任总稽核，统管财务。

昆仑公司继续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下集，即将完竣之际，夏云瑚提出要撤资出国，另谋发展，同时力主将昆仑归并到文华影业公司老板吴性裁的麾下。

吴在战前就是老联华公司的三巨头之一，战后在上海独资组建了文华影业公司，经济实力雄厚，同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人员多有渊源，与蔡楚生、夏云瑚私交甚密。吴性裁早就有意兼并昆仑，夏、吴把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请到吴家赴宴，谈了三天三夜，后来任宗德也参加了商议。由于阳翰笙、史东山和任宗德都反对兼并，协商未成。夏云瑚甚为不悦，坚持要撤资退股。

阳翰笙认为不能丢掉这块左翼电影阵地，便找到任宗德说：“夏云瑚闹着要走，我很不满意；吴性裁要接管昆仑，我更不愿意。夏云瑚要走就让他走吧。昆仑的事，就由你顶起来！今后，就由你来掌管经营昆仑公司吧。”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国内上映获得成功，夏云瑚携拷贝远走香港、新加坡、印尼，行前提走了约五百两黄金的股本，从此在资本上脱离昆仑。根据阳翰笙的

意见，保留了他的董事长名义。

致命一击

拍《武训传》血本无归

自1947年冬起，任宗德以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身份，成为事实上的掌门人，昆仑公司进入了“宗记合作制片”时期。此后昆仑公司出品的影片《新闺怨》（史东山编导）、《万家灯火》（阳翰笙、沈浮编剧，沈浮导演）、《关不住的春光》（欧阳予倩编剧，王为一、徐韬导演）、《丽人行》（田汉、陈鲤庭编剧，陈鲤庭导演）、《希望在人间》（沈浮编导）、《三毛流浪记》（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乌鸦与麻雀》（沈浮、陈白尘等编剧，郑君里导演）等，都是任先生运作资金拍摄的。

这些影片都是民营电影的优秀代表作，但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民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精神消费成为奢侈，票房效果不佳。在政治、经济形势的制约之下，昆仑公司颠峰已过，再也没有出品像《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大制作。

而拍摄《武训传》，把昆仑公司推上了绝路。该剧的电影剧本，是导演孙瑜在陶行知先生推动下，根据清末奇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创作的。《武训传》于1948年在国民党官方的“中制”开始制作，仅拍摄了三分之一，即因时局变化中止。昆仑公司购得版权，并延请孙瑜加盟昆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夏衍等人的推动下，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在北京通过了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的审查之后，又经上海市宣传、文化、电影部门的再度审查，于1950年2月开始续拍，主要演员赵丹对武训角色的把握十分到位。导演孙瑜对这部巨片期许甚高，希望会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成就。为此任宗德筹集了约相当于七、八十万银元的制作经费，最终增补为上、下两集。

1951年初，《武训传》拷贝送到北京，请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审映”，获得肯定；其后毛泽东也调看过此片。

《武训传》最终被正式通知通过了审查，于同年2月在全国公映，一时好评如潮，昆仑同人欢欣鼓舞。但4月25日报刊就开始了武训其人的批判，并扩大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武训“对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该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武训传》的全面围剿。

伟大领袖认为影片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指责一些共产党员“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说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慑于威势，党内赞扬过此片的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纷纷检讨，郭沫若、夏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被迫在报刊和座谈会上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

早在1948年，中宣部《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中，就已正式提出要建立电影审查制度，并对审查标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获得政权之后，这一指示走向

制度化。1951年文化部公布了有关颁发新片上演执照、影片进出口、电影旧片清理的管理办法，建立起比前政权更为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电影艺术首当其冲，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也紧随其后，开始了由缪司向婢女演变的进程。

苦力支撑中的昆仑公司，经济上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五十年代初任宗德及昆仑公司写给父亲的书信中，已多次提到无力偿付欠款。那时投资大片与今天的“电影洗钱”不同，投资人是要自己承担经济风险的。《武训传》禁演后，任宗德欠下巨额债务，陷于破产境地，昆仑公司就此一蹶不振。

雨暴风狂

影坛精英凋零殆尽

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是以民营电影为载体的。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辉煌之后，民营电影在政治大变局中走向没落。

国民党时代留下七家民营电影公司，在1949年至1952年间陆续拍摄了五十八部电影，除《武训传》外，昆仑公司的《我们夫妇之间》、文华公司的《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及长江公司的《两家春》等，皆影响甚大。

民营电影以《武训传》遭批判为开端，迅速走向灭亡。连年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使电影艺术日益工具化，国家话语占据了影坛。江青则成为电影事业幕后最大的权势人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史东山首当其冲。三十年代江青为进入电影界，曾托魏鹤龄向他引荐，但东老认为此人顶多是个二流演员，未予重视；于是她又通过司徒慧敏结识蔡楚生，才获得了电影《王老五》中的角色，后来又拍过《狼山喋血记》。

1949年东老推掉了海外片商十二万美元的片约，毅然北上参加新政协。五十年代初，他和江青同列为“电影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江曾两次挟嫌报复未成。1955年批判胡风时，江青两次带卫士深夜登门，逼迫他就胡风案件做检讨（江无端怀疑他是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电影部分的执笔者）。一周后，重病中的史东山自杀身亡。他在陷入昏迷前曾自行用灰锰氧洗胃，如及时抢救，尚有生还希望，但被某电影界负责人以须“请示中央领导”为由阻止。

东老在遗书中说：“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份遗书被上交中央领导。当时周恩来正在接见班禅，临时中断接见听取紧急汇报，当场落泪。而周所能做的事，是调动专列将一具玻璃棺材从上海运到北京，为这位老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发了一纸《革命干部死亡证明书》。一桩文化名人自杀的公案，就在这刻意的哀荣中沉入海底，直到“文革”中才被江青重新翻出，扬言“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

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同人也连遭厄运。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茵及其夫君孟君谋双双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这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扯起“虎皮”的“旗手”更是丧心病狂，欲将其底细的电影界同事们统统置之死地而后快。蔡楚生是早年识拔她的“伯乐”，1949年后改走政治路线，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还把《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女主人公素芬的投江自尽的结局，改为到解放区投奔革命。“文革”中蔡被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其他电影人中，郑君里、孙师毅、徐韬、孟君谋、上官云珠、舒绣文等也未能幸免。阳翰笙、孙瑜、白杨、陶金、赵丹、吴茵等虽劫后

余生，但艺术生命早已被提前扼杀。

夏云瑚1957年从海外归来后，翌年被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聘为顾问，曾以“椅子质量”、“椅子成本”为题，发表关于影院经营管理文章，为计划经济下的电影发行献计献策；“文革”初期他身陷囹圄，1968年含冤辞世。

蔡叔厚五十年代受“潘汉年、杨帆案”的牵连，一直不被信任；“文革”中被捕，1971年也成为秦城监狱中的冤魂。

倾家荡产支撑左翼电影的任宗德，1954年被安排到电影局基建处当一名副处长，后调至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工作，“文革”中又备受磨难；晚年定居香港，写下《我与昆仑——一个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人的自述》存世。

十年浩劫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物质生活，也加速了社会分化，体制性的腐败重新成为社会顽症。而对于那段文化专制主义历史的反思，至今仍被层层设障。

曲终人散

云月水流皆成绝响

昆仑公司于1951年9月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又并入准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1953年民营电影业全部转为国营垄断体制。国营体制没有生存压力，却有《武训传》的前车之鉴，电影从业人员的企业心和事业心日益消沉。

至此，自1905年发轫的中国民营电影业，经历了四十八年的凄风苦雨，最终在中国大陆成为历史。

父亲的民营电影之梦早在国民党时代就已彻底结束，他作为企业家对两片投资的利润，也没有了下文。任宗德在抗战胜利时，是一位拥有巨资的民族企业家，转变角色成为电影事业家后，最终在五十年代初以破产告终。返观父亲在到达巅峰前的急流勇退，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抉择。

夏云瑚在海外活动十几年后回国，任宗德说：“他见到我时倒是很客气，但只字不提昆仑公司财务资金之事。我当时也不便追究，彼此间维持着一般的关系。”不久，夏独自与电影局、中影公司就最后处置昆仑公司影片版权及财务等事，签署了协议，将昆仑公司应该保留和享有的权益一概交出。事后任宗德得知此情，很有意见，曾向电影局有关领导反映过。父亲当时已钦定为“右派头子”，更完全被排除在外。

中国电影界历来是史、蔡并重，1949年以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备受褒扬，《八千里路云和月》则被长期冷落。翻开1963年成书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明显感到一种“抑史扬蔡”的意味，对已经逝世的史东山早年的“唯美倾向”乃至《八千里路云和月》、《新闺怨》皆有苛评，而对当时仍在当权的蔡楚生等人物，评论的尺度则有所不同。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三个“第一”：“七·七事变”后第一部反映全面抗战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抗战胜利后第一部揭露社会现实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建国后第一部反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片《新儿女英雄传》。

在五十年代初完成的《新儿女英雄传》中，我们已找不到史东山电影所特有的个人印记，但这种印记在其电影学术观点中仍然凸显。1949年7—9月间，他曾发表过三篇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电影方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其中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而也应该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工农兵的利益选择一切题材来写……

终究是形势比人强，他因此挨过江青的整，被指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后来电影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长影厂的出品《荣誉属于谁》时，他又当场对江青的专横提出异议，成为这个女霸王的眼中钉。到1955年批判他的老朋友胡风时，江青再度登门施压。他在便笺上写过“对胡风是人身攻击”的字句，又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苦闷中东老曾对夫人透露：“她说主席要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数日后即辞别人世。

东老的女儿史大里曾谈及，虽然父亲的遗书被收走，她却从现场收存了三张字条，其中两张写着“漫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还有一张为“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她透露：“父亲辞世之前，曾与母亲有长谈，但母亲对谈话内容守口如瓶。”如今老夫人已重病在床，这件事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不久前，我与东老的长孙史晨原，对坐于北京郊外的茶室中，谈起他祖父的悲剧。他不认同某电影史学者关于史东山作品反映出自杀倾向的观点：“我祖父不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艺术家，他是个温和、细腻、有良知的人，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处境和爱情；以浪漫的、理想化的视角来看待现实，期盼并热爱新中国；但在新中国里，他做不了违背艺术良心的事情，被逼到墙角之后，唯一的解脱只能是弃世……白杨认为，他是以死抗争的英雄式人物。”

告辞出来时暮色已深，月光下浮云流动，银汉依稀。我恍觉有无数之目光，透过云层注视着万家灯火中的尘世；那些电影人的亡灵，或许正在时空中游荡；他们曾用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呼唤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却又被这时代所吞噬；这诡异莫测的夜空，便是他们永远的银幕……

人生无不散之筵席，时代留旷世之悲怆。文化专制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墓。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思想一旦被屠杀，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史东山在五十年代“玉碎”，蔡楚生活到六十年代也未能“瓦全”，两部巨片是他们艺术生涯的最后辉煌。两位大师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章乃器、任宗德、夏云瑚三人的民营电影之梦，也正如两片的片名一样，历经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最终“一江春水向东流”……

作者简介：

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章乃器先生之子。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中国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曾撰写和发表《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1957年》、《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毛诗漫品》等著述；合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民国著名人物传》等；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